

青年学术文库 |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孔尚任和 《桃花扇》新论

>> 徐爱梅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013068308

1207.37
44

青年学术文库

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

徐爱梅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018

44

80883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 / 徐爱梅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07-4759-0

I. ①孔…

II. ①徐…

III. ①《桃花扇》—戏剧文学评论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7189 号

责任编辑: 董付兰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7.5 印张 20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得到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und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IFSDU

前言

一个人的遭遇总是离不开他的时代环境，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而在社会环境的诸因素中，文化政策的影响尤不可小觑。综观历史上对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恰恰在这方面关注得不够。实际上，孔尚任一生的沉浮穷达及《桃花扇》的意义，都和康熙朝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康熙朝的文化政策及其与孔尚任创作的互动关系来理性地考察孔尚任和《桃花扇》，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孔尚任的诗文活动以及有关材料，书中都会有不同于他人的论述和看法。比如，我们可以同情孔尚任被罢官的遭遇，但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如同孔尚任的被额外议用，孔尚任的被罢官也是康熙朝文化政策实践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孔尚任(1648~1718)，年轻时就博学多识，精通儒家典籍和儒家的诸种仪式规范，对音乐和曲艺多有研究，也精于赏鉴并热爱收藏文物字画。但他在37岁遇到康熙皇帝之前，只不过是一个中了秀才却过不了乡试关的落魄书生。这和他的山东同乡蒲松龄^①(1640~1715)，颇有相似之处，但在遇到康熙之后，孔尚任的人生境遇和蒲松龄相比却是云

^①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著有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蒲松龄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为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前后共做了42年塾师。1715年正月，蒲松龄病逝，享年76岁。

泥之别。孔尚任踏入仕途后,喜欢和诗友们结社唱和,饮酒赋诗,再加上他酷爱收藏,所以日常开销不小。虽然他也常说自己捉襟见肘,甚至月俸钱不够一天的花费,但那是指他在购买古董文物方面的“奢侈消费”,总起来看,孔尚任的仕途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曲阜祭孔时被额外议用,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官,孔尚任经历了十六年的仕宦生涯。级别也从正八品的国子监博士一直升到从五品的户部清吏司员外郎。

这期间,孔尚任担任国子监博士长达十一年,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中间有四年(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至康熙二十八年暮冬)还作为康熙亲命的湖海使臣赴扬州治理河道。虽然孔尚任抱怨国子监博士的生活清闲、冷落,但是这却使他有了充足的时间享受和诗友们饮酒赋诗的风雅生活,而且和他来往的不乏当时颇有声望的官员、文人,比如王士禛、万斯同等人。从扬州返京后,孔尚任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并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七月和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戏曲试笔之作——历史剧《小忽雷传奇》,并将其搬上舞台演出。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孔尚任升为正六品的户部主事,任职宝泉局监铸(宝泉局是清朝两大铸造钱币的机构之一,在当时人眼里这是一个肥差),一时间,和他来往的人也禁不住纷纷向他借贷,让孔尚任哭笑不得,他在给好友张潮的信中说自己不是贪腐之辈。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他用心写作多年的《桃花扇》完成,京城王公缙绅传抄借阅者众多,以至于今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康熙也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剧本观看。不仅如此,孔尚任开始在他的好友们的宴会上让伶人演奏《桃花扇》助兴。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元宵节,京城著名的昆班金斗班开始公开演出《桃花扇》并引起轰动。孔尚任可谓春风得意,因为今年三月他又被晋升为从五品的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这是孔尚任仕途的顶峰,但没想到很快就跌到了他人生的谷底——旋即被莫名其妙地罢官。

孔尚任在京任职期间,每逢衍圣公孔毓圻^①进京拜见康熙,康熙赐

^① 孔毓圻: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袭封衍圣公。



宴时总是少不了孔尚任作陪。康熙御赐曲阜圣物、派太子曲阜祭孔这类大事也总要孔尚任亲随前往。虽然他后来被罢官，但身为圣裔又屡被圣恩眷顾，从曲阜故里到江南，再到北京，孔尚任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不太真实而又炫目的光环。遗民和诗人们因为他是圣裔而尊敬他，视他为师长、朋友；官员们因为他有康熙额外议用的身份而在和他交往时保持着客气、友好的态度；家族里的亲戚们也以他为荣，把家传的文物带到京城送给他。

二

孔尚任常常抱怨国子监博士是“冷署”、“闲官”，甚至有时穷困到无米下锅的地步。但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一点，我愿意从孔尚任的一本非文学的小册子《享金簿》说起。

孔尚任一生的多种著作在当时都已公开流传并广为人知，但《享金簿》例外。世人知道孔尚任曾编有《享金簿》一书，是在民国年间。民国时期邓实(1877~1951)于上海旧肆发现了《享金簿》，并将其辑入《美术丛书》刊行问世，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2004)据《美术丛书》本重印。此书仅有孔尚任抄本流传，应该是孔尚任后代保管不善丢失所致。严格意义上说，《享金簿》不能叫作书，而是孔尚任一生收藏品的明细账本。据统计，《享金簿》凡著录孔尚任收藏品157件，种类繁多，包括书画碑帖、青铜器、砚石、乐器、古玉、古尺、古纸、钱币、紫砂壶、瓷器、文房清玩等。数量最多者为书画碑帖，共计89件，其中不乏稀世珍品，譬如书画作品有宋拓《淳化阁帖》(得之内府)、宋拓《淳熙秘阁续法帖》、唐李白《自书诗卷》(用玉鱼换得)、王维《江山雪霁图》(得之一僧人)、宋董源《秋山晚霭图》、夏珪《千岩竞秀图》、宋徽宗画《白鹰》(据孔尚任说应是内府物)、元赵子昂《大字赤壁赋》(孔尚任儿子购得)、明徐渭《葡萄诗》手稿、唐伯虎《桃花坞图》和《秋村图》、沈周《登大石图》、文征明《云崖图》、董其昌《溪山平远图》、谢时臣《丹山碧海图》、崔子忠《十八尊者卷》、陈洪绶画《水浒卷》，还有明燕王靖南割付五幅、崇祯帝的山水画和书法各一幅等。其次是青铜器和砚石，有夏鼎、商母乙鼎、周素鼎以及其他铜器，有宋东坡子石砚、陆游松皮砚、宋八骏绿端砚、松花石、蜡石、阴阳石等12件。再有就是古乐器，有汉玉羌笛、唐代官廷胡琴小

忽雷、羯鼓、宋代琵琶大海潮(宋代内府乐器)、雕漆箫、镂牙笙、明代琵琶小吟蝉、阮琴8件。

孔尚任在《享金簿》里对每一件收藏品都交代了来历和去向,所以笔者了解到,有些珍贵的收藏品当时已不在孔尚任手中。如黄庭坚的书法作品——《黄山谷书黄龙晦堂和尚开堂书》本来是孔尚任的一个族弟的收藏品,后辗转被孔尚任的族孙孔爱咨得到,并带至北京孔尚任住处相赠,但最终被衍圣公孔毓圻“借”走贡入大内。夏珪的《千岩竞秀图》是孔尚任从海陵商贩那儿用千钱购得的,但从扬州返回北京收拾行装时因为手头紧而卖给吴剑宜,后被衍圣公赎回存于孔府。孔尚任收藏的赵子昂的书画作品共有五幅,其中一幅《青山绿水图》是从小贩那儿购得,因为小贩不识货,所以非常便宜。后被画友借走,不知何故充作公物,孔尚任大叹可惜。

今天,孔尚任的这些收藏品绝大多数已散佚不可见。只有那把存放于故宫博物院里的琵琶乐器小忽雷,还能让我们想起它曾经属于过孔尚任。孔尚任购得唐代官府胡琴小忽雷后,和顾彩合作创作了《小忽雷》,并在当时上演。之后,小忽雷又经历了更曲折的传奇:据清代文人桂馥的《晚学集》记述,康熙五十七年(1718),孔尚任去世后,其子携琴入京,不慎丢失,“遗于道左”,为王斗南得之。后辗转多人之手,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文物部门才从刘氏老人处购得这件流传民间千余年的古代乐器小忽雷,调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件稀世珍品已被载入大型画册《中国乐器图鉴》中。

从孔尚任《享金簿》的收藏品名目来看,孔尚任购买这些收藏品的花费不是小数目。他在《小忽雷》的开场《博古闲情》里就说过:“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勾一朝挥。”国子监博士的月俸还不够他买一件古鼎彝、一册残书卷的,可见其热衷于“奢侈品消费”。孔尚任在扬州时也说过家人对他这项爱好很不满意,《湖海集·与吴剑宜》札云:“谋饱无计,搜篋中仅有旧书二卷,蒙代典十金,可支一月矣。平日买书卖画,每为家人所恶,今获书画之济,家人虽不言,吾以意骄之。”旧书二卷就可以典得十金,可支一月花费,这显然说明“月俸钱支来不勾一朝挥”的说法不是夸张之语。



孔尚任很愿意刊刻自己的诗文，但一生都没打算把《享金簿》公之于众。孔尚任在给朋友们的书信里常常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进行或者要完成的作品，但是从没向朋友们提到过《享金簿》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他当然有将其公之于众的机会，对孔尚任来说，刊刻他的作品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比如扬州著名出版商张潮和他关系很好，在孔尚任从扬州返回北京后，多次写信向孔尚任索要了多部作品如《（人瑞录》、《出山异数记》）收在他主编的《昭代丛书》^①里，著名诗人王士禛还托孔尚任的关系把自己的《鹤经》推荐给张潮收录。孔尚任也把一些朋友的相关作品，比如程石林的《鹤鹑谱》、石村年的《画诀》等，推荐给张潮收录。那么《享金簿》作为孔尚任收藏的书画碑帖金石文物的总集，自然也可以收录在《昭代丛书》里。

孔尚任不愿意将《享金簿》公之于世，笔者猜测这主要是里面多是价格不菲的珍贵收藏品的原因，孔尚任不愿意“露富”，尽管这些都是他节衣缩食用俸禄购得的。这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孔尚任每每诗中表达的“送穷”、“叹穷”并非如蒲松龄一样揭不开锅。

这些艺术品一部分为亲友所赠，由此可以看出孔尚任和他们非同一般的交情。比如扬州著名遗民宗元鼎在孔尚任到达扬州时，虽已经很少参加文场应酬之事，但他却和孔尚任保持着较多的私人交往，并将“家藏近百年”的古琴相赠；足不出户的遗民高士闵义行，将家藏的倪云林大幅《烟鹤图》题诗相赠；孔尚任在下河局帮助冒襄的儿子冒青若谋得了一个差使，为了表示感谢，冒襄让儿子把家藏明代画家关九思的《书林秋屋图》小轴赠给孔尚任；明代书画家祝允明的三卷书法真品乃“一得于燕市，一得于族弟，一得于族孙”；徐渭的《葡萄诗》原稿，“予族弟秋浦，赠予小卷，乃原稿也”。

其他藏品则大多为孔尚任宦游南北时费心搜获，根据他在《享金簿》中的记载，可知有得之“莱阳旧家”者，有得之“毗陵士林”者，有得之“广陵新胜街”者，亦有得之“越人余叔庵”者，而得之京师“燕市”、“燕

^① 《昭代丛书》是专门收集清人杂著的丛书，如山舄、水舄、花舄、鸟舄、鱼舄、酒舄、书舄、御舄、数舄等。

肆”、“庙市”、“慈仁寺”、“燕京后土祠”者，则更不在少数。

在当时，收藏古玩字画、金石玉器是文人们的一个高雅爱好，孔尚任也是如此，不过更痴迷而已。从《享金簿》所收录的这么多珍贵的收藏品来看，对孔尚任来说，维持这个爱好的花费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

从孔尚任来看，我敢说他绝对不是“三

出”。孔尚任收藏的古玩字画，除了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的那把小忽雷，其他的已不知流落何处。但是孔尚任的诗文、戏曲等著作却一直流传下来。孔尚任在《致张潮书》中说：“第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旅邸郁胸，间作词曲，比之古人饮醇酒、近妇人，亦无聊之极思耳！”

“十五年拙宦，碌碌无成”，虽是孔尚任自谦，但也算是中肯的自评。孔尚任在仕途上兢兢业业，但确实没有突出的政绩。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书生，而不是一个典型的官吏，无论是国子监博士，还是湖海使臣，乃至在户部任宝泉局监铸，他喜欢的都是在尽职尽责之后的空余时间，和诗友们饮酒赋诗、赏鉴文物、登高抒怀的诗人的风雅生活。他说自己“兼作词曲”是“无聊之极思”，但其实这恰恰是他对历史的贡献。

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虽然幸运地兼有着圣裔的身份，但孔尚任在连举人都考不中的落魄情况下，得到康熙的额外议用的确是人生中的“异数”和奇迹。这种奇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康熙文化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康熙继续推行入清以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政策，必然要以奖赏符合这种文化政策的人物和事迹作为旗帜，来达到他拉拢汉族读书人的目的。当康熙通过他的诸多政策达到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之后，他当然不会抛弃孔尚任，就像他并没有抛弃孔尚任的族兄孔尚钺一样^①，只要他们继续坚持着康熙的文化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孔尚任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康熙在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的过程中，选中了孔尚任作为时代的鼓吹

^① 孔尚任和族兄孔尚钺同年因进讲得授国子监博士一职，又在同一年被升迁为户部官员，二人也常在京城共饮。孔尚任在为孔尚礼所写的墓志铭里，称赞孔尚钺在户部任上，天天面对如山的赋税文件，常向人说道：“吾但竭吾力焉耳！能免于罪，则天也。”孔尚钺于康熙三十六年冬病逝于户部主事任上，孔尚任为他写有《户部江南清吏司主事雪谷先生暨原配路安人合葬墓志铭》。



手，而孔尚任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也实践着康熙的文化精神。在《出山异数记》里，孔尚任感叹他遇到康熙的经历是“异数”，是他一生中的奇迹；年长康熙6岁的孔尚任更在书中把康熙对他的关心喻为父子情谊。康熙提倡儒家温柔敦厚、发性情之正的诗教，孔尚任作为康熙亲命的湖海使臣，到扬州后论诗既不宗唐，也不宗宋，而是鲜明地提倡“性情诗”。在他的倡导下，扬州诗文的创作表现出“感于盛世者则深”的主流文学的特点。孔尚任还以其尊贤敬老的儒家长者风范，为康熙争取了那些不愿和清朝合作、甚至拒绝康熙召见的遗民们对清朝统治的认同。康熙在《过江陵论》中赞明太祖朱元璋，叹明朝亡于昏君佞臣、亡于门户党争、亡于士气浇漓，孔尚任在《桃花扇》里便明确地跟着《过江陵论》的论调，无限痛恨地指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明无一非私，焉得不亡！”

但孔尚任不是一个纯粹的时代的鼓吹手，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儒生，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诗人，一个伟大的戏曲家，一个热心看众生、冷眼看历史的人。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亲至曲阜祭孔，在游览孔林时，康熙指着一棵大树询问树名，孔尚任马上机敏地回答“俗名椽子树”。康熙却笑着指出：“本名榭树，乃木旁加斗斛之斛。朕胡人，不必讳也。”康熙大度地把孔尚任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于是，在《桃花扇》里，孔尚任除了跟着康熙的步调褒忠贬奸外，在《余韵》中也大胆说出了康熙不肯对明太祖朱元璋说的话：你的臣民（遗民）没忘你！他甚至更无情地指出繁华成败一切都将归于虚无的历史规律：“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是孔尚任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戏曲家的伟大之处，他的仕宦生涯也让他看到了封建体制内滋生的毒瘤——“私君、私臣、私恩、私仇”现象所具有的自我毁灭性。在孔尚任看来，一切皆从一己利益出发，不顾大局、“无一非私”的岂止是南明王朝！三年扬州的湖海浮沉，让他饱看了清朝治河官员你死我活的激烈党争、惊人数字的贪腐，（这个王朝）“焉得不亡”也就是早晚的结局了。孔尚任和晚他七十年而生的曹雪芹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日光景，又因为找不到挽狂澜于既倒的妙方而充满了绝望的情绪。



这也是他被罢官的根本原因,当这个鼓吹手开始吹奏出不符合专制思想日益强化的时代的音符时,康熙便巧妙而果断地罢了他的官职,让他停止演奏。

可以说,孔尚任人生的大起大落都和康熙及其文化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孔尚任的仕途是成也康熙,败也康熙;孔尚任的文学创作始终受到康熙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从他在扬州提出的“性情诗”论,到《桃花扇》对康熙《过江陵论》的亦步亦趋,以至他被罢官还乡之后从事的修志工作,都表明孔尚任一直努力地和康熙的“文化精神”保持着一致。但作为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成功的传奇戏曲大家,孔尚任的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情感力量是孔尚任和康熙皇帝都无法影响和决定的。所以,当《桃花扇》的反思触及了封建制度体内产生的“贪污、腐败、党争”痼疾,当《桃花扇》的演出掀起了一股强烈的遗民怀念故明的伤感思潮时,孔尚任便被罢官了。这不仅仅是康熙皇帝对曾经的宠臣孔尚任的抛弃,也是康熙朝的文化政策对以孔尚任为代表的创作者及其倾向的淘汰。

所以,本书对孔尚任和《桃花扇》的考察与以往论者不同的地方是:在康熙朝文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从孔尚任和康熙的关系出发,考察孔尚任一生的行踪及其文学创作,考察康熙的文化政策和孔尚任创作的互动关系。此书虽以“新论”作题目,实则多是对旧问题的重新思考。旧题重提,视角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敢附和前人。所论当否,还请专家指正。

作者

2013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康熙的文化政策和孔尚任的出山异数	(1)
第一节 康熙的文化政策概述	(2)
第二节 康熙曲阜祭孔与孔尚任的出山异数	(8)
第三节 《出山异数记》等文中对康熙的感恩	(19)
第二章 康熙朝的盛世雅音与孔尚任的诗文活动(上)	
——康熙的诗教观及影响	(26)
第一节 康熙“性情之正”的诗教观	(27)
第二节 提拔风雅词臣,勉励风雅诗作	(30)
第三节 和声以鸣盛——君臣唱和,共谱盛世雅音	(34)
第三章 康熙朝的盛世雅音与孔尚任的诗文活动(下)	
——孔尚任的性情诗论与扬州文学的繁荣	(37)
第一节 扶风振雅倡文教——孔尚任在扬州的诗文活动	(38)
第二节 尊贤敬老是使臣——孔尚任与扬州遗民的交往	(45)
第三节 孔尚任的“性情诗论”和创作	(51)
第四章 “一阴一阳之为道”	
——《桃花扇》中的《易经》文化	(69)
第一节 《易经》之“假象见义”与《桃花扇》的人物设置	(70)
第二节 《易经》的中正思想与《桃花扇》人物的道德评价	(75)
第三节 《易经》之名小旨大与《桃花扇》的不奇而奇	(82)



第四节 《易经》之审微思想与《桃花扇》的忧患意识	(87)
第五节 《易经》之“阴阳对举”与《桃花扇》之“天然对待法” ..	(92)
第五章 《桃花扇》的曲体艺术研究	(99)
第一节 《桃花扇》曲体的继承——曲名不取新奇	(99)
第二节 《桃花扇》曲体的创新——制曲必有旨趣,文词 必求新警	(110)
第三节 《桃花扇》曲体的创新——曲白相生	(118)
第四节 《桃花扇》的曲体创新——自作上、下场诗	(126)
第五节 《桃花扇》的曲体创新——声韵响亮,情韵相合	(127)
第六章 明亡史面面观:康熙、孔尚任与遗民的三种态度	(137)
第一节 康熙对明朝诸帝的态度及其深意	(138)
第二节 《桃花扇》——一篇形象的《过金陵论》	(147)
第三节 从遗民泪看《桃花扇》的成功与孔尚任的被罢官	(160)
第七章 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 ——孔尚任和《平阳府志》、《莱州府志》	(170)
第一节 《平阳府志》、《莱州府志》的传承与创新	(171)
第二节 得性情之正,感风气之和 ——新见孔尚任莱州诗文创作述录	(177)
附 录	(189)
主要参考文献	(221)

第一章

康熙的文化政策和孔尚任的出山异数

在结束了血与火的武力征服之后，1644年，满清政权占领北京，取代明朝开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是，这个由少数民族通过杀戮与掠夺建立的新政权，要想在思想上确立对民众的统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领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①读书人为“四民”之首，他们的思想情操、处世态度对其他社会阶层都有很大影响，他们的向背可以说也代表着民心的向背。

清初，汉族士人对明朝的忠诚、对清朝的仇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人心的动荡，是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汉族士人的这一心态当然极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清初统治者以尊孔崇儒为核心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招揽人才，比如继续用科举考试选拔读书人、以博学鸿儒科征召遗民中的硕儒、聚集读书人编修一系列文化典籍等，因为清政权深知，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学说是千百年以来汉文化的核

^①（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心,是赢得和聚拢汉族读书人心、拉近满汉之间距离的重要法宝。而实践证明,清王朝的这种文化政策及招揽人才的模式,无疑是它能够实现长期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康熙在以上诸种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有特殊贡献的。孔尚任的戏剧人生就是在康熙文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上演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儒家思想的发祥地曲阜,凭着天时地利人和,当然会得此风气之先。也就是在这种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政策下,孔尚任,一个博学多识却在举业之路上困顿的秀才,没有落魄为同时代的蒲松龄,而是幸运地因为他的圣裔身份,在康熙皇帝曲阜祭孔时得以在御前讲经,并得到康熙的额外议用,从此平步青云,跻身于清朝的官僚阶层。此后,他北上京城任国子监博士,南下扬州做湖海使臣,升迁为户部主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一部《桃花扇》使他无限风光,也戏剧性地终结了他的仕途。他一生的遭遇,如同他的代表作《桃花扇》一样,极富戏剧性。使他的人生大起大落的,正是康熙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文化政策。

第一节 康熙的文化政策概述

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已经认识到儒家思想和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在关外,他就确立了“以文教治世”的方针,并对汉人广为招降纳叛,常常采用汉官的建议。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皇帝,他也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并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化政策,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

这些政策对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由此,清朝的统治也渐趋稳定。但是要实现长治久安还需假以时日。可惜顺治英年早逝,仅创其例,而未及一一将其付诸实施。

康熙初年,以辅政大臣鳌拜为首的一部分保守的满洲贵族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轻视文教,排斥汉官,力主回归满族“淳朴旧制”,推行了文



化上全面倒退的政策，在汉族士人及百姓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康熙于康熙八年果断清除了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继续继承并积极推行皇太极和顺治对汉文化的政策，尊重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全面吸收儒家学说，重视提拔、任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使得众多读书人以及明朝遗民纷纷为康熙朝效力，可以说，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到康熙年间，已经趋于完善和卓有成效了。

康熙的文化政策有以下重要举措：

第一，发布“十六条”圣谕，确立文教为先的国策，并以实际行动尊孔崇儒。

康熙亲政后，将世祖制定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以“文教为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原则。康熙九年(1670)十月谕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义以闻。”^①康熙要求“部院衙门将现行处分条例重加订正，斟酌情法，删繁就简”，以“上谕十六条”行世为准，以“人伦”为先，将教化作为治国重点并在各级学校和有关部门中推广实行。

而康熙的尊孔，可以说是终生的。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亲诣太学祀孔，向孔子像行三跪六叩首之礼。笔者查阅《圣祖实录》发现，此后康熙每年都要祭拜孔子，时间或在年初，或是孔子诞辰，先是自己亲祭，以后则委派台阁官员。在尊孔方面，康熙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亲赴曲阜孔庙孔林祭拜孔子一事。

^① 《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461页。